

前言

本书是 2009 年 12 月 30 日由白帝社出版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以下称《第一集》)之续集。此次,本书除着重收录亲属称谓词以外,也将从词汇的体系性观点出发,收录一些与第一集所收的条目有关联的词汇。此外,也尝试做新的突破,刊载有关音韵体系和民俗的地图。

关于《第一集》的评价,承蒙《汉语方言地图集》主编曹志耘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专文撰写书评“读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刊载于《方言》2010 年第 4 期。此外,曾参与校阅《第一集》之石汝杰教授(熊本学园大学),也将于近期在《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发表对本书的评论。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受到中国学者如此的关注,诚感光荣,亦觉欣慰。

然而,根据方言地图重新拟构语史,这样的“解释”工作相对于历史悠久的汉语历史语言学来说,可谓才刚定位,还有诸多问题必须面对。

第一,我们的研究本身尚未成熟。多札(A.Dauzat)曾说过,“方言地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问,尚未站稳脚步(*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st une science qui se fait, un être jeune aux pas encore incertains*)”(Dauzat 1922, p.44)。对此我们实在深有同感。每每在绘制地图时,都有新的发现,有时甚至还必须修正先前的推论见解。例如,关于呈现“长江型”分布的词形,我们原来认为其多数起源于江淮一带。在《第一集》地图中出现的“今天”、“明天”、“冰雹”、“膀子”、“打摆子”等词形(地图 3-2、7、24-2、33-2、43-1),还有本书出现的“爷”(〈叔父〉义)、“爹”(〈祖父〉义)、“麻雀”等例,都是“长江型”分布的例子(地图 4、6、20)。事实上,这些词形或其用法起源于江淮一带的可能性很高。再者,在构成现代普通话的词汇中,大致可以确定有不少起源于江淮地区的。但是本书所载的“壁虎”及其相关词汇的地图(地图 25、26)告诉我们以下的事实:“壁虎”现在呈现长江型分布,但是此词形过去也在淮河以北地区广泛分布,后来被“蝎虎”所取代,就是因为“壁虎”的语音被“蝙蝠”、“蚍蜉”(〈蚂蚁〉义)等牵引(类音牵引),结果发生了同音冲突,导致“壁虎”的分布领域缩小。因此,我们即使看到某些词形集中在长江流域,也不能直接下断言,说该词形就是起源于江淮一带。

第二个问题是,在 20 世纪,方言地理学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被现代语言学界所忽视。这是因为“方言学是历史音韵学的专利”此一观念早已深植人心,加上学术界普遍没有意识到语言地理学能为理论语言学界(包括认知语言学)提供多种素材所致。

在《第一集》中,关于词源探索和词汇变化,我们强调以下两个重点:

- 1) 语言变化的不连续性
- 2) 在词汇变化中之非机械性因素(non-mechanical factors)的作用

在探索某一方言词(现标做 A)的词源时,就算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了可以视为其词源的某一个汉字(现标做 X),词源探索也不能说就此结束,因为我们不能保证 A 就是以 X 来表示的词的直系子孙。这是依靠语音和词义的相似性为理论基础的词源探索及比较法容易掉入的陷阱。如“天”、“雨”、“山”、“湖”、“马”等单音节词,从上古时代至今,遵循着音韵变化的规律,进行着有连续性的变化。这类词汇变化可以说是在“无菌

室中的变化”，因为这些词就如空气一般，在日常会话中说话者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任意性的符号。然而，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词汇或多或少会产生不规则的变化。所谓“变化的不连续性”这一想法，就是主张抛开词形一定照着音韵规则进行机械性变化之固有概念。在产生非连续性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通俗词源”。另外一种重要的因素是说话者无意识地发出的“语音牵引”（亦说“类音牵引”，上述“壁虎”即为其例）。凡这些妨碍连续性变化的因素也都可以称作“污染因素”，但这却正反映出人类语言丰富的创造性。在词汇变化中，这些因素的应用是反复无常的，所以我们以非机械性因素称之。

方言地理学在此还有一个如同宿命般的课题必须解决。因为非机械性因素在变化中是否产生作用，只能透过观察地图，经过个别分析之后才能作出判断。但是这样的解释对读者而言，似乎显得太过随意，不够缜密。方言地理学的宗师日叶龙(J. Gilliéron)的著作之所以会被认为难以理解，就是因为他使用比喻和格言来讨论所有变化的可能性，最终达到一个最合理的结论。如此历经千回百转所得到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一个词的历史”。对读者来说，还是用一套简明的理论就能推导出古代语言面貌的比较法，让人觉得较为科学。然而，舍弃所有这些应与变化相关的因素拟构出来的结果，就一定是真理吗？方言地理学所表达的“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其宗旨即在说明历史变化中每个词都有各式各样相互串连的要素。伟大的比较语言学家梅耶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一方面警惕着方言学不能仅埋首于各个孤立的词汇研究中，一方面又对地理学的研究意义深表认同(Meillet 1925: 60-71)。至少我们可以断言：在欧洲或日本所发现的语言变化机制在汉语或其他语言当中也会存在；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所发现的各种现象必定在历史上存在过。

曹志耘教授在上述书评中，对《第一集》的地图 30〈蚕豆〉给了简明扼要的评论。从这一评论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和解释还有说服力不足之处，这里以本书登载的地图为例做进一步的说明，以供读者参考。

1) 我们的解释必须根据地图及语言事实为基础

离开地图的解释无非只是单纯的空想。现从简单的例子入手。请看地图 37〈自行车〉和地图 19〈睫毛〉。下列词形都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西、广东以西的南方地区，并分别形成连续性分布：

- (1) 〈自行车〉：“单车”、“线车”、“钢丝车”
- (2) 〈睫毛〉：“眼睫毛”、“眼睛毛”、“眼毛”

语言地理学认为，若有复数的词形在地理上形成连续性分布（《第一集》称作“推移性分布”），而且其语音和语义上又有关联时，这些词形很可能来自同一词源，柴田武(1968)称之为“邻接分布的原则”。“线车”和“钢丝车”在词义上有某种关联性；“眼睫”和“眼睛”既有词义上的关联性又有语音上的共性，即第二音节都为精母字(*ts)。因此，我们认为该地区曾发生过下列变化：

- (1) 线车 > 钢丝车
- (2) 眼睫毛 > 眼睛毛

这种解释也许能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同。然而，地图 37 解说还认为“线车”来自“单车”，地图 19 解说则认为“眼毛”是“眼睫毛”或“眼睛毛”的第二语素脱落所致。对这些见解也会有人提出异议。譬如说，“单车”和“线车”在词义上不大相关，因此“线车”

一词的产生跟“单车”没有关系。这种见解的分歧是在语言地理学研究中是难免的，对此可能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可能性更高的是哪一种见解？如仔细观察地图 37，我们就能发现“线车”在湖南及江西有隔断“单车”分布地域的趋势，也就是，两种词形形成“ABA”分布（单车—线车—单车），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单车”>“线车”的假说（参见《第一集》绪论，p.20）。

2) 词形分类的抽象度因条目而异

词形的分类是画地图的前提（《第一集》绪论，p.12）。〈自行车〉、〈睫毛〉两条是属于词形种类较少的条目，对这种条目谁做分类，其结果也会是大致相同的。然而，如何处理词形种类更多的条目，此乃我们最下工夫的地方。最典型的条目是〈蜘蛛〉（地图 27）、〈蜻蜓〉（地图 28）、〈蝉〉（地图 29）等昆虫的名称，词形种类上百，甚至达到几百个。但我们还是必须追求分类。譬如，称说〈蝉〉的词形可能多数来自拟声，因此各地也会平行产生类似的词形。但我们发现北方的多数词形都取“X+l-”或“X+n-”结构。这里 X 代表任何一个语素（少数也有 X 之前又前加一个修饰成份的），l 和 n 代表任何一个 l-声母或 n-声母开头的音节。如此归类也带来惊人的结果，譬如，“知了”和“秋凉（虫）”归于一个类（即地图 29-1 的 A-1 类）。看起来是很不相同的两种词形，但确实共具“X+l-”结构。这可能暗示着属这一类的词形都是同一个词源的后裔。另外，我们通过分析小动物的名称发现，声调（调类）是分类上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参见地图 27-29 解说）。

3) 一个词形必有其前身存在

说“变化的不连续性”可能容易招致误解，因为一个词形若非从上古至今都维持不变的话，就必定有其前身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词汇变化不会是“不连续”的。

〈自行车〉之类的新生事物一般都是名称和事物一起带进来的。很难想像〈自行车〉带到江西、湖南时是无名的工具。那么，叫什么呢？我们据地理分布判断，〈自行车〉当初被称做“单车”，而其普及的过程中老百姓把它改称为“线车”。

《第一集》地图 16 是〈喜鹊〉，本书地图 20 是〈麻雀〉，作者均是木津祐子先生，但我自己曾在校内的一个小型研究会上介绍过这两幅地图。当时着重讨论了在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情况，即〈喜鹊〉义的词带上了“麻”字（如“麻衣鹊”）而〈麻雀〉义的词却失去了“麻”字（如“小雀”、“小虫”），为何？有一个学生发言：“‘麻衣鹊’这一说法来自〈喜鹊〉的形状及颜色，是‘穿上麻布衣服的鸟’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吗？”没错，他的俗词源说也说出真理的一面。但是假如说我们的探讨终结于这种一次性的思考的话，语言地理学就会失去做为历史语言学的一门分科存在的理由。这里我们必须根据地图思考，要问原来使用于〈麻雀〉义的“麻”字为何“拷贝”到表〈喜鹊〉义的词形里去。“麻衣鹊”应为后起的词形，而它应有其前身。

4) “非机械性因素”的作用超越音韵规则的束缚

〈喜鹊〉义的“麻衣鹊”应来自“鸦鹊”(*a tsh^hiak)或“野鹊”(*ia tsh^hiak)，这种词形在中原地区带上了“麻”字就是由于它被〈麻雀〉义的“麻雀”(*ma tsiak)牵引所致。然而，这一语音牵引的另一个结果是，原读不送气声母的“雀”字变读为送气声母，以致与“鹊”字同音了。又，本书地图 25 及 26 显示“壁虎”、“蝙蝠”、“蚍蜉”等词形展开的类音牵引现象。这里我们要阐明的问题有很多，如原为平声的“蝙”和“蚍”为何变成了入声字，又如原读不送气声母的“蝙”为何变读为送气声母，等等。

通俗词源的产生往往也以语音的类似性为条件。譬如，北方有些方言把〈壁虎〉称做“蛇虎”，从分布情况可以判断，这一词形应来自“蝎虎”（见地图 25-2）。这一变化的发生是以“蝎”[ciə^{阴平}]与“蛇”[sə^{阳平}]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但这两种语素声韵调都不合。因此说，在变化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词义，即说话者感觉“蛇”比“蝎”还切合表达〈壁虎〉的形象。上文说，“眼睫毛”变成“眼睛毛”，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以“睫”和“睛”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但推动变化的是〈眼〉义词的变化，即“眼”>“眼睛”。总之，凡是理据性低的词形都易于受到非机械性因素的作用，而这种因素的作用则超越了音韵规则的束缚。

5) 在谈词汇变化时也需要持有词汇体系的观点

上文引用梅耶(A. Meillet)的警言：方言学不能仅埋首于各个孤立的词汇研究中。由此来看，如有某一方言以使用词根的“爷”来称呼〈父〉，我们也不能保证这种“爷”是女英雄木兰用过的“爷”的直接后裔。因为这种“爷”也可能是原来用以称呼〈伯父〉或〈叔父〉的，而后来转用于称呼〈父〉的。在汉语方言的历史中某一亲属称谓词根转而变指另一种亲属范畴，这种变化曾经是频繁发生的。出于这种观点，本书登载了几幅类型地图，如地图 1-1（父系长辈亲属称谓系统）、地图 32-3（蜜蜂和蜂蜜）、地图 38（“房、屋”的类型）等。

2010 年 11 月，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议则以由曹志耘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 年，商务印书馆)及我们的《解释地图集》等的出版为契机而兴起的研究方言地理学的潮流为其背景，筹备工作全部由曹教授及北京语言大学诸位承担。与会者或以《汉语方言地图集》，或以中国各地的方言为主题，展开了许多以地图为基础的议论。这是在我们 1994 年刊行贺登崧神父论文集《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好文出版)一书时所始料未及的光景，令人无限感慨。

继《第一集》的编纂有黄晓东先生参加，本书又加入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王莉宁、支建刚、张勇生(现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以及来自熊本学园大学的刘艳(现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作品，均为这些年轻研究者在金泽大学短期或长期研修时期的研究成果。能与背负着中国方言研究之未来的青年才俊直接对话，着实是个令人兴奋的经验。

本次出版还受到诸多协助。感谢沈德思教授和石汝杰教授如前一集一样，给予帮助，再次担任了翻译、校阅、校正等繁复冗长的协助工作。另外，也要感谢金泽大学的研究生黑田谱美、陈怡君、日高知惠实，在校正和语言数据的输入方面贡献了莫大的精力。在此一并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岩田 礼

2011 年 7 月 31 日